

政治传播研究前沿书系

主 编 ◎ 荆学民

副主编 ◎ 白文刚

H

istory of Ancient
Chinese
Communication Policy


中国古代传播 政策史

何勇 ◎ 著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中国传媒大学“双一流学科建设”资助项目



History of Ancient
Chinese
Communication Policy

中国古代传播 政策史

何勇◎著

中国传媒大学 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古代传播政策史 /何勇著. --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19. 6
(政治传播研究前沿书系)
ISBN 978-7-5657-2443-5

I. ①中… II. ①何… III. ①政治传播学—方针政策—历史—中国—古代
IV. ①D691.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034235 号

中国古代传播政策史

ZHONGGUO GUDAI CHUANBO ZHENGCESHI

著 者 何 勇
策划编辑 吴 磊 张 旭
责任编辑 王 硕
特约编辑 陈 默
封面设计 拓美设计
责任印制 阳金洲

出版发行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阳区定福庄东街 1 号 邮编: 100024
电 话 86-10-65450528 65450532 传真: 65779405
网 址 <http://cucp.cuc.edu.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玺诚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25.25
字 数 453 千字
版 次 2019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57-2443-5/D·2443 定 价 11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错误

负责调换

主 编：荆学民

副主编：白文刚

编 委（按姓氏笔画为序）：

马 婧 白文刚 苏 颖

李丹林 李彦冰 何 勇

张毓强 荆学民 祖 昊

序言

◇ 朱羽君

大约两年前,何勇来家看我,他告诉我他正在写一本《中国古代传播政策史》,我当时听了有些疑虑,这么冷僻难做的课题,能行吗?他却兴致勃勃地向我叙述起来,他说:传播其实是一个广义的概念,人类在社会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总在寻求传播的手段和途径,以求信息的流动、求自身的生存。在社会系统形成以后,官方便会利用对信息的控制,达到巩固统治和稳定社会秩序的目的。传播政策就是指统治阶层对信息传播活动的管理策略,所以即便在古代,传播活动都是有迹可循的。中国浩瀚的史料和丰厚的文化积淀是一个宝藏,可供研究者以各种角度去发掘探寻,使其条理分明地呈现出一个个不同的脉络,形成不同的学科。所以从传播学的角度去研究中国古代传播政策的形成和发展是可行的,也是一项有价值的工作……我听说说得有道理,而且难得他如此有兴趣,我觉得值得鼓励,兴趣是研究工作获取成果的重要因素。再说,他之所以选择这样一个课题,是有他的原因和有利条件的。

何勇原是我1997级的硕士研究生,曾和我一起研究中国的电视纪录片、电视纪实语言,又在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栏目工作过一段时间,那段工作经历对他思考官方政策与传播活动的互动有很大触动。后来读博士,师从我国广播电视史学专家郭镇之教授,毕业后留在中国传媒大学政法学院讲授传播政策、传播法方面的课程。所以他想写《中国古代传播政策史》是有研究基础和学术积累的。

我虽对此课题没有研究,但当时就他的思路给他提了点建议,我觉得记述历史和制作电视纪录片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讲求事实的真实,以事实说

话,所以要尽可能地运用经过考证的史料,把我国古代历史上有关传播的记载、故事、案例整理清楚,从古代各个时期、各个朝代所发生的案例中梳理、叙述和分析,找出其自身的逻辑,这既是历史著述的要求,也会把这一冷僻难做的课题论述得生动易懂。

现在,两年过去了,何勇真的抱了厚厚的书稿来看我了。他要我为他的书写几句话。我没有思考过这方面的历史,只能对他的勤奋和认真的研究精神表示赞赏,看来他对中国的历史是下了很大功夫研究的,书中汇集了神话时代、巫祝时代、春秋战国、秦、汉、唐、宋、元、明、清各个时期的一些有关传播的史料,对各种仪式、制度、礼教、禁令、律条、榜文、邸报、京报等传播方式和策略进行了梳理和分析,叙述出各个时期统治者对传播的重视、利用,或严格的控制,以及传播手段随着政治、经济、技术(如印刷术)等的发展而发展,朝代的更替中各种权力的博弈在传播中的表现等等,这些在书中都有确证的史料和案例来说明,尤其在唐、宋以后的章节中,这种叙述更为细微突出,使读者能从史料中做出自己的认知和判断,读起来也较有趣味。至于其中的意义和对当下的观照,就让读者自己去品味吧,正如优秀的纪录片一样,重要的是给予观众认知和判断的空间。

书只写到清代,到了现在,尤其是21世纪以来,传播已蔚然成为重要的研究学科,社交媒体突飞猛进,对人类社会各方面的影响真所谓翻天覆地,值得我们去认真思考和探究。中国古代对信息和舆论的种种管理实践和社会效果,为我们今天制定传播政策和制度提供了视角和观照,而作为一个年轻的学者,又面临着许多新的课题,希望他继续努力,为现在及未来的传播事业的发展,做出更深入的思考和研究。

2017年5月14日

- 1 导 读
- 7 第一章 神话时代:起源
- 9 第一节 传播的起源:象征符号与仪式传播
- 31 第二节 传播政策的起源:仪礼独占与扩散
- 48 第二章 巫祝时代:明命鬼神为黔首则
- 49 第一节 古史:巫行教化
- 54 第二节 二里头文化的仪礼体制
- 58 第三节 先鬼后礼:殷墟和卜辞中的祭祀
- 66 第三章 观风化俗:先秦早期的朝野对话
- 67 第一节 上以风化下:周公制礼与孔子诗教
- 73 第二节 下以风刺上:民谣与采诗制度
- 81 第四章 春秋横议:禁言与纳谏
- 81 第一节 子产:存乡校与铸刑鼎
- 85 第二节 悬书之禁
- 87 第三节 孔子诛少正卯
- 90 第四节 大谏之官:谏议制度的产生

97	第五章	战国争鸣:稷下论政与归心于壹
97	第一节	稷下学宫:齐国不治议论
101	第二节	商鞅变法:秦国归心于壹
105	第六章	秦汉相袭:从言禁到大一统
105	第一节	书同文与焚书令
110	第二节	秦汉诽谤法的兴废
117	第三节	除挟书律和抑黜百家
123	第七章	东汉清议和党锢
123	第一节	清议活动与月旦评
127	第二节	党议与党锢
130	第八章	唐代邸报:中央与地方的信息博弈
130	第一节	邸报与邸制
136	第二节	进奏院状的产生
138	第三节	进奏院状的性质
142	第九章	宋代的传播政策:控传报、禁小报
143	第一节	进奏院改制
146	第二节	令格之制
153	第三节	定本兴废:事前检查制度
158	第四节	小报之禁
166	第五节	出版政策
191	第六节	公共批评

- 203 第十章 以宽得之:元代传播政策
- 204 第一节 十六天魔舞
- 208 第二节 礼乐之殇:教坊司沉浮
- 213 第三节 茅山诗案与文字政策
- 219 第四节 文艺禁毁与聚众之禁
- 221 第五节 戊午之辩与书籍禁毁
- 227 第十一章 教以化俗:明代传播政策
- 228 第一节 卧碑之条:生员不得言事
- 235 第二节 删孟与祭礼之争
- 240 第三节 律令讲读:《御制大诰》与《教民榜文》
- 253 第四节 书籍禁毁
- 263 第五节 讲学风行与书院禁毁
- 275 第六节 明代的邸报
- 295 第七节 复社运动:晚明文人结社
- 310 第八节 有风西来:利玛窦的传播活动
- 327 第十二章 训士化民、校讎同文:清前期传播政策
- 328 第一节 聚众与结社之禁
- 337 第二节 陷文不活:清朝文字狱
- 354 第三节 传阅之罪:孙嘉淦伪奏稿案
- 360 第四节 《四库全书》:为古今定本
- 379 第五节 清前期报纸:官方与民间的妥协
- 391 余 论
- 392 后 记

导 读

无传播,不社会。传播不仅是社会系统正常运行的基础,而且是社会控制的手段和途径。虽然中国古代没有传播政策的概念,但是官方对信息和言论的管制实践自古存在。

“传播政策”(Communication Policy)是一个新兴概念。西方传播学界一般将此概念与“媒介政策”(Media Policy)互换使用,强调政府与媒介的互动关系。20世纪晚期,它作为对新型政策范式的概括,指代技术融合、传播自由化以及信息和传播迅速扩张背景下的政策制定。^①

与西方学界将“媒介产业”作为政策的特定调节对象不同,本书语境下的传播概念,采用其广义外延,即信息和意见的社会流动。“传播政策”则是指政府针对传播活动的管理策略,及其与政治、社会和文化系统的相互建构。这里涉及凯瑞所说的从传播“传递观”到“仪式观”的转变:传播的起源和最高价值不在于“智力信息的传递”,而是“建构并维系一个有秩序、有意义、能够用来支配和容纳人类行为的文化世界”^②。

“政策”的概念同样存在广义和狭义的理解。狭义上,政策是条文的、设计性的、系统化的社会控制手段,即“在追求某些目标上对政治手段的系统利用”^③;而广义上,它强调观念性、正当性和实际的社会效果,强调政策环境

① CUILENBURE J V, MCQUAIL D. Media policy paradigm shifts towards a new communications policy paradigm[J].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03, 18(2): 181-207. 此文提出,传播政策源于追求国家利益与商业企业利益之间的互动。传播政策反映了特定背景下政府与产业界的博弈以及权力与利益的平衡。

② 凯瑞. 作为文化的传播[M]. 丁未, 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5: 7.

③ 柯武刚, 史漫飞. 制度经济学: 社会秩序和公共政策[M]. 韩朝华,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0: 38.

与政策制定者之间的互动。科尔巴奇提出“政策是观念框架的一部分”，“也就是我们理解世界是什么和世界应该是什么的方式，以及证明实践和组织安排正当性的方式，这其中还包括那些在统治过程中寻求通过政策来表达利害和行动的人，政策也是证明他们的正当性的一种方式”。^①

本书语境下的“政策”采用其广义概念。一方面，政策是官方意志的体现，传播政策反映的是政府及其所代表的主流意识形态对传播活动的基本态度和处置策略；另一方面，政策又是相关方权力、利益博弈的结果，是历史性和社会性的体现，其思想来源（比如政治理念）和合法性基础（比如价值认同）根植于特定的历史阶段和社会关系。借用阿尔都塞所言，统治阶级对社会意识形态的控制体系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既定事实，即官方限定的体系可以自动复制相应的强制规则和社会意识，“因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从来都不是阶级斗争的既成事实，从来都不可能摆脱阶级斗争本身对它的影响”。^②

因此对传播政策的解读，需要将其放入社会系统中去考察，即“寻找传播政策在总的政治经济形势中的位置，包括历史和今天的位置”^③。当然这不是说在具体操作上我们需要对每个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状况进行教条和模式化的描述。一个基于传播史的合理和必要的做法是，从具体的传播主体、传播行为及其考证结果出发，关注可能存在的政策表征，尤其是影响政策制定的话语、叙事、观念体系的建立和变迁（即政策环境）。由此，可以取得三种效果。第一，可以折射出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第二，可以直接反映出特定历史阶段的传播图景；第三，在政策动机不明确、概括不完备的时代，传播实践是唯一的政策表征，而在政策概括相对完备的朝代，既存的传播行为也是重要的政策佐证。实际上，政策本身就包含着有意识层面和无意识层面，对于后者，我们需要从零散、无序和具体的传播行为中获得启示。

与其他政策体系一样，传播政策的确立也是一个社会的历史的过程，其本身是“根植于不断发展进步的社会文化过程中的一个过程系统”^④。政策梳理的目的就在于通过对政策本身或激发政策的社会条件进行历时性的记录和分析，形成全面认识和建构传播价值观的基础。当代传播史和传播理

① 科尔巴奇.政策[M].张毅,韩志明,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10.

② 此处为借用,这段话本义是针对资本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管理而言的。阿尔都塞 L.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M]//陈越,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320-375.

③ 莫斯科.传播政治经济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255.

④ 德罗尔.逆境中的政策制定[M].王满传,等译.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10.

论即使在归纳人类传播行为方面,也是远远不足的。对传播政策的历史性呈现,有助于我们了解传播是什么、从哪儿来、又到哪儿去这些基本命题。

传播政策史是人类传播史的组成部分。它以社会性的传播活动为起点和依托,涵盖国家信息政策、渠道管理、舆论政策、思想管理、政治传播、宗教传播、文化统制、文艺制度、出版政策等诸多方面,描述和概括中国古代官方在不同历史条件下所使用的各类政策工具,包括其理论基础和来源、制度结构和功能、行为效果和评价;既是从政策角度来解说传播史,也是从传播角度来解读政教史。概言之,我国古代传播政策以政教为第一,余皆附庸。

本书为专门史,采用通史的记述方法,基本按照时间顺序叙述相关史实。方法论是重史料及其考证,轻主观演绎,尽量罗列史实,保证其还原度。由于各个历史时期传播活动(或事业)发展阶段、史料丰陋情况的不同(比如宋代以前,相关史料一鳞半爪,较难形成系统),各章节的侧重便有不同,体例上也会有所差异。出于集约化和阅读方便考虑,某些专题性传播政策内容,比如“禁书”“私学”“讲学”“结社”等,会在某个此问题相对突出的朝代集中进行历史梳理,而不会在所有朝代分散描述。

在叙述过程中,本书尽量避免没有实证的话语误导,比如说“夏朝”之存在,由于没有考古学的证据,所以在古史传说中保留“夏”之称谓,而在历史叙述中则不提此概念;另外比如“封建社会”之说,秦朝实施郡县制度之后,严格意义上的封建之制基本结束,所以在历史概括中也尽量不使用相应的词语;再比如晚明“商品经济”以及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由于这些概念都是专有词语,所以尽量不用,概括时使用描述性的“商品流通”等词语。当然,所有历史都是当代史,政策史的分析术语更是来自当代。在描述的过程中,会运用诸如“公共空间”“信息不对称”和“政策价格”等学术表述。为了与当代背景下的话语有所区分,在文中对这些概念的应用做了详细的说明。下面对本书各章节加以导读,请读者注意其中的逻辑关系。

本书的第一章“神话时代:起源”,叙述的是人类传播活动与政治秩序发生的最早联系,因为“政策首先与秩序有关”^①。无文字时代的历史重构一直是个难题。由于上古传播史料和考证的不足,第一章第一节不得不花较大篇幅对史前的人类传播行为,尤其是早期象征符号和仪式传播形态和作用机制进行资料补充和考证,当然这并非无的放矢,无文字时代的传播政策突出表现在祭祀制度中,而仪式传播构成了它的基础。在加入最新考古材料和相关民族学证据之后,史前传播在社会秩序建构中的基础性作用大致可

^① 科尔巴奇.政策[M].张毅,韩志明,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12.

见；第二节“仪礼独占”部分进一步考证“传播政策”的起源。此时，自在状态的传播活动进一步结构化，并对政治统合产生影响。虽然古史中“绝地天通”的传说对统治阶层垄断人神沟通（即信仰及其渠道控制）有详细描写，但是古史无法自证。本书结合最新考古材料，对“仪礼独占”和“仪礼扩散”进行了考证。考古材料所显示的“巫王合一”与“神权独占”和古史传说有着一定的互释性。仪礼独占和扩散是最早的文化共同体得以形成的“一体两面”，奠定了古代中国的地理和文化基础。

第二章“巫祝时代：明命鬼神为黔首则”同样是从古史和考古材料的角度对巫祝文化到礼乐文明转折时期的传播政治进行描述和论证。古史与考古材料的错位及统一，是过渡时期历史材料的一大特色。“巫”是这个时期精神世界的统治者。此时传播政策体现在两个层面，一个是古史中反映的最早的“政教”思想（虽然古史描述的是虞舜时期，但是其思想反映的是其编纂年代，即春秋、战国时期的主流认识）；一个是考古材料所反映的“仪礼独占”（主要是葬仪和礼器）的进一步实践和演化。到商代国家时期，巫祝文化的“鬼神世界观”塑造了“先鬼后礼”的政教模式以维护其政权的合法性，具体形式和证据则来自对青铜礼器（纹饰、铭文）和祭祀仪式（甲骨卜辞）的考证。

第三章“观风化俗：先秦早期的朝野对话”部分的描述，已经接近我们今天对于政策概念的理解，比如说“采诗”“编诗”“陈诗”制度。不过在这个政策体系背后，史料所呈现的则是周公和孔子对于国家秩序，尤其是礼教建构的思考。我国最早的民意的观点和民本的思想就出现在这个时期，并由此衍生出德政和德教的传统。“观风”与“化俗”并行，是西周传播政策的显著特点。

第四章“春秋横议：禁言与纳谏”突出的是特定时代政治家的传播政策行为和政策讨论，比如子产的“存乡校”“禁悬书”“造刑鼎”；孔子赞同乡校、反对刑鼎、诛杀少正卯等事迹。春秋时期关于公共空间、成文法颁布、异端言论处置的种种争论，塑造了后世思想和舆论管理的主导思路。本书将中国历史的“谏议制度”安排在这个章节，“谏议”出现在春秋时期，是体制内的意见传播和反馈，是臣子谏诤和君主纳谏二位一体的过程，秦以后则体现的是君主专制下国家政治体系的自我完善。

第五章“战国争鸣：稷下议政与归心于壹”，记录战国时期以言论和舆论政策为主要内容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强国模式”。齐国“不治议论”和秦国“归心于壹”（或者说弱民理论）出于相同目的，却产生了不同的效果。稷下议政造就了百家争鸣的高峰，而商鞅则开创了传播政策的“中央集权”模式，并与重农抑商、户籍管制、农战之国等政策相配合，为秦国兼并六国、成就大

一统奠定了基础。

第六章“秦汉相袭：从言禁到大一统”，记录秦代沿用法家思想，将言禁政策（主要是诽谤法和焚书令）法律化。不过以法为教的纯粹空心化的思想控制无法满足专制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建构的长远需要。汉代吸取秦二世而亡的教训，一方面“除挟书律”“废诽谤妖言”，另一个方面“推明孔氏，抑黜百家”。儒家伦理道德自此独霸意识形态，为汉武以下近两千年的政治和文化传播圈定了主要内容。

第七章“东汉清议和党锢”，记录秦汉以后首个士人议政的高峰以及政府对其的禁锢。这部分集中描述公共批评出现的历史条件，即官方对意识形态控制的弱化，包括在主流价值观与皇帝威权发生冲突的情境下，朝堂与民间舆论互动的基本模式。

第八章“唐代邸报：中央与地方的信息博弈”，描述传播政策的另一个侧面，即中央与地方的信息不对称。唐进奏院状的出现，是唐中晚期信息主导权易手的信号。这里重点关注中国最早的官报发布机构“进奏院”的制度变迁，以及中央与地方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的权力博弈。信息的流向最终反映了时代的政治秩序和权力格局。

第九章为“宋代的传播政策：控传报、禁小报”，此时我国传播政策在针对性和系统性上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将唐及五代隶属藩镇的进奏院归之于中央行政体系，并建立邸报（中央官报）体系，是君主专制理性的发展。雕版印刷的普及为大宋“以文治国”创造了条件，相应的出版和书籍政策逐步出台。此外，商品流通的发展激活了信息本身具有的流动性、实用性和商业价值，媒介呈现出发展方向上的诸多可能。中央、地方、民间的博弈构建了宋代传播政策的基本框架。中国古代“禁书”政策流变被安排在这个部分。

第十章“以宽得之：元代传播政策”，描述民族融合大背景下的传播政策取向。元代是宋代走向系统化的传播政策的中断期。由于缺少建构主流文化的意识，元代传播政策表现出零散、无序的特征。当然，它的开放性文艺政策独具特色。跨文化交流的实践以及文艺管理机构的功能设计是这个时期的重点。特殊的政治和文化环境促进了戏曲创作的繁荣。

第十一章为“教以化俗：明代传播政策”。明代的传播政策承接了宋代的严密性和系统性，在通过传播手段加强思想专制等方面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明初文本和渠道的垄断，科举、八股、程朱传注的配套设计，为大明登上思想专制顶峰创造了条件，但是随着政局和社会的演变，传播话语权有了明显的下移。在这个背景下，文化的公共空间向政治的公共空间转化。明代的公共批评、邸报传播、书院讲学、文人结社等构建了中晚明特殊的传

播版图。中国古代“普法”“私学”“结社”“宗教传播”的四项政策梳理被安排在这个部分。

第十二章“训示化民、校讎同文：清前期传播政策”，是本书的最后一部分。清军人关打破了明末社会内生的自然演变过程。清代相当程度上继承和加强了明初强化中央集权的传播策略。文字狱、编书、禁书则是夷夏之防、朋党之禁、教化万民的主导思想下走向极端化的传播政策的体现。清代近乎完备的传播政策对后世影响直接而且巨大。

以上就是对本书各个章节内容的导读。特别要指出的是，本书第一、二章表面上看属于传播史的范畴，似乎与本书“传播政策史”的取向无关，实际上，这两章正是全书的基础。第一，起源阶段的人类传播比较清晰地勾勒出，以象征符号为基本单位的传播行为通过仪式和叙事产生社会结构功能的原理和机制。第二，政策动机不明确时代的传播系统已经预示着传播行为与政治秩序必然形成相互构建的依存关系。具体而言，早期仪式独占对社会秩序形成的意义，与渠道控制（或者说信息不对称）对后世政治秩序的价值存在着完全一致的对应关系。

官方的传播行为也是一个容易被忽略的领域。传播渠道的管理不仅在于对体制外信息流动的控制，更在于官方主流的确立和扩张。由于种种原因，后者很多时候缺少政令或奏议形式的政策化素材。在笔者看来，对官方具体传播行为的经验性归纳，同样是可靠和必然的政策表征。这部分内容在很多时期甚至成为政策描述的主体。同理，民间的传播活动也未必能找到相应的政策依据，但是社会存在这些活动本身就透露出很多政策信息（比如明代民间报纸合法化问题）。

整体而言，本书的系统性是逐步显现的，越晚近年代系统性和结构性越强。这符合人类传播活动及政策行为的发展轨迹，也符合越晚近年代史料可获得性越强的客观情况。即便如此，本书还是尽量保持比例上的均衡，通过抓取典型事例体现历史上各个时期独特的传播行为和政策图景，特别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继承性和变革性。

中国古代的社会管理，是以政策为导向（或者称人治）的治理模式。作为其重要环节之一，中国古代传播政策的基本面貌是信息屏蔽（渠道垄断）和思想专制。不过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同样体现出我国文化内在的基于民本和人本的理性、宽容和开放，以及随着社会经济、文化发展进程而产生的足以影响政策制定的各种物质和精神力量。直到今天，这些或以意识形态、或以文化传统、或以价值偏好、或以政治理念为表里的传播观，仍在方方面面决定或影响着我们的政策制定。

第一章

神话时代:起源

信息是用来消除不确定性的东西。^① 20世纪“信息论”的概念同样可以解释人类“幼年时代”的传播活动。在史前蒙昧的漫漫长夜中,先民们开启了与外界和自我的信息交换。人类面临的生存压力,加上群居本能,^②导致“蛮野人”在物质与精神上依靠团体的程度要比“文明人”深得多。^③ 这大概就是人类传播活动的起因。

现当代的考古发掘和民族学研究表明,旧石器晚期的人类已经能进行象征物的制作,并且有着多样的原始精神生活。“对于蛮野人,一切都是宗教”。^④ 在中西方的史前遗存中,最早出现的人类造像是动植物和巫师,最常出现的生活场景是洞穴、墓冢和祭坛。虽然这些只代表先民生活的一小部

① 1948年,美国数学家香农在题为“通讯的数学理论”的论文中指出:“信息是用来消除随机不确定性的东西。”香农是信息论的创始人,提出“信息熵”的概念。

② 《吕氏春秋·恃君览》有云:“凡人之性,爪牙不足以自守卫,肌肤不足以御寒暑,筋骨不足以从利避害,勇敢不足以却猛禁悍,然且犹裁万物,制禽兽,服狡虫,寒暑燥湿弗能害,不惟先有其备而以群聚耶?群之可聚也,相与利之也,利之出于群也。”英国心理学家威尔弗雷德·特罗特(W. Trotter)认为人类生来具有的生存本能包括保存本能、营养本能、性本能和群居本能。转引自弗洛伊德.集体心理学和自我的分析,自我与本我.长春:长春出版社,2004:86-90.不过弗洛伊德本人对此观点有所保留。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认为,对于人类起源较为可信的假设是,人类天生是群居的动物,人类从没作为隔离的个体而存在,人类的社交性不是因历史和文化产生的,而是天生的。参见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M].毛俊杰,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25,34.

③ 马林诺夫斯基.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M].李安宅,译.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6.卡西尔对此也持相同看法,参见卡西尔.符号,神话,文化[M].李小兵,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207.

④ 马林诺夫斯基.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M].李安宅,译.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8.

分,但是我们发现,原始宗教(巫术—宗教,或巫教)确实曾经贯穿先民的生活经验和精神生活。

巫术仪式是人类传播活动的最早形态之一。^①先民们“以舞降神”^②是严格意义上的传播行为。它包括表演的行事层面与叙事的话语层面。^③象征符号的制作和传递,加上共同社会心理下形成的意义,构成了仪式传播的完整环节。史前时代的巫师,不仅是巫教和巫术活动的主持者,也是当时生活经验和文化知识的保存、传播和整理者,可以说是最早的智识阶层。^④

源自原始仪式的祭祀制度是无文字时代传播政策的表征。祭祀是趋于规范和模式化的仪式传播,是人神沟通的礼仪化渠道。它发轫于氏族,进而扩散到部落,^⑤“在维系秩序、行政管理和风俗等方面”^⑥发挥作用。在上古中国,宗教仪式助推社会结构形成秩序模式,遂成礼乐制度的主要源头。

仪礼的独占是传播政策的起源。专职巫师的出现及其对礼器的垄断,意味着祭祀成为少数人的特权和象征。^⑦“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在部落兼并、走向古代国家的过程中,统治阶层通过“绝地天通”垄断祭祀仪礼,独占意识形态。因仪礼独占及其扩散形成的意识形态之整合,其意义并不亚于兼并战争对于古代中国所起的催生作用。

人类在跨入政治秩序之初就不可避免地触及了传播的本质。“传播的起源及最高境界,并不是指智力信息的传递,而是建构并维系一个有秩序、有意义、能够用来支配和容纳人类行为的文化世界”。^⑧作为传播政策标记的史前仪式转型,不仅是人类传播活动的自然进程,而且是国家起源时期走向政治秩序的必然内容。

① 美国学者詹姆斯·W.凯瑞提出无论传播的“传递观”还是“仪式观”都有明确的宗教起源,参见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M].阎克文,江红,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3-8.

② 许慎的《说文解字》中有:“巫,祝也。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

③ 哈里森.古代艺术与仪式[M].刘宗迪,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2.

④ 宋兆麟.巫与巫术[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9:7.

⑤ 摩尔根.古代社会[M].杨东莼,马雍,马巨,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78-80.

⑥ 卡维斯·里德的观点,转引自普里查德.原始宗教理论[M].孙尚扬,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57.

⑦ 恩格斯认为,祭祀是部落或部落联盟最高代表的特权和象征。参见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03.

⑧ 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M].阎克文,江红,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7.